中山大學報

2016年4月25日

SUN YAT-SEN UNIVERSITY GAZETTE

一版责编、美编、校对：徐津阳　二版责编、美编、校对：卢旖维

吴承学：从容一些 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郭媚媛 卢旖维

人物简介：

吴承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研究方向主要是“古代诗文”，学术专长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明清诗文”等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等多种。曾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6篇，《文学评论》17篇，《文学遗产》25篇。

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5次。《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

记者访谈：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大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这是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此前，您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论“诗能达人”与“诗能穷人”》已分别获得第四届与第六届的优秀成果二等奖。十年内三次获此殊荣，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吴承学教授(以下简称“吴”)：就中山大学中文学科而言，自2002年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获得首届一等奖，至今已13年。时隔多年，中大中文学科再次拿下一等奖，我看作是学术界对我、对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团队的充分肯定。我研究中国文体学已近三十年。近十年三次获奖，都集中在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

记：这么看来，学术界对中国文体学已相当重视了。请问中国文体学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

吴：中国文体学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具本土特色的理论话语基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文体学呈式微之势。中国文学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粗疏地代替或遮蔽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中国文体学研究就是要立足本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到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重现中国本土文学与理论的特殊光辉。激活中国智慧与中国风采，为建立中国文艺学提供借鉴。

记：傅璇琮先生曾说，您有一种坚实而敏感的学科建设意识。您是如何进入和建设中国古代文体学这个学科的？

吴：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入文体学研究领域，谨遵“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之古训，持续近三十年，未敢放弃。除了传播与重续断裂的传统之外，更重在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拙著《中国文学风格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三种是我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文学风格学》已再版，《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出了三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则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本书提出“中国文体学学科”概念，力图梳理出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了以文体史料学为基础，以文体史、文体学史和分类学、风格学等为主体构架的基本研究格局。

记：《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书中，《诗人的宿命》一章很有意思，读后深受感动，得到许多启发。它与一般的文体研究只是研究外在形式截然不同。请以此为例，谈谈您的独特文体学研究方法。

吴：一般以为，文体就是研究语言形式。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文体学深层包括丰富的人文与美学意蕴。以《诗人的宿命》一文为例。我们一般都说“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其实，古人还说“诗能达人”“达而后工”。这在古代本来是两个同时存在的诗学论题。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诗能穷人”说法获得聚焦放大，“诗能达人”说则被遗忘或遮蔽，形成文学批评中“诗人薄命”的理论倾向。这种很有趣的现象，其实是中国人对于诗歌文体的选择与接受。它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的集体认同：“诗不仅是一种爱好与技艺，更是高尚的精神寄托，是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神圣信仰。”可见中国古代的诗歌文体研究，已远不是具体形式，而是直指中国诗学高妙的精神本质与深刻的人文关怀，反映出中国文学的本土与本体特色。

记：您一直很强调学者的责任感与传世意识。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传世”？您认为您的论著中有哪些可以传世的吗？

吴：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每天都有海量的论著发布。以现代科技发达的储存功能，要把这些论著储存起来并不难。所以传世不是指其物质形态，而是指其学术价值的持久有效性。曹丕《典论·论文》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个“传”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学术自身的魅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传世，这其实是个价值判断问题，恐怕难以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觉得，传世之作至少需要具有一种超越性。能超越前人，超越当下，指向未来。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力量足以抵制时光的流逝和淘汰。它成为后人的工作基础，无法绕开它。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作品可以传世，但知道哪些不能传世。

记：您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四辑，备受学术界的好评。您接下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在文体学领域会继续探讨哪些问题？

吴：长期以来，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古代诗文评，一是文体学。以后这两个方向会坚持做下去。文体学是个富矿，可开掘的东西太多。我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中国文体学研究丛书”和《中国古代文章文体史料集释》等，力图从文体史料学、文体史、文体学史等方面为推动中国文体学研究尽自己的力量。至于具体的工作，要看客观条件而定。

记：您认为，文科与理工科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吴：有一次，一位理科教授问我，你们的论文怎么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呢？我说，我以前也觉得你们几十人、上百人写一篇论文很奇怪呢。这就是学科的差异吧。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思考，所谓孤独的思想者。理工医科有一个国际普适的标准，人文学科当然也有奇文共赏，但往往见仁见智。理工医科的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而人文学科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实用价值，往往只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甚至很难说什么“创造”。人文学科特别需要长时段的积累。光是要了解那些基本典籍，可能就需要十几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人文学者比较晚熟，当然又比较“抗老”，成果不太容易过时。

记：您认为，人文学者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吴：我曾有个比喻，学术研究如同画圆圈，圆规两脚的长短，决定圆的大小。同样，学者的研究能力决定其研究成就，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须有“旧根底，新眼光”，这两者就如圆规的两脚。当代传统文化研究者须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各学科，必须有较好的基础；同时对于当代的各种文学思想、研究方法，也要加以吸收，兼收并蓄。但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而言，最困难、最急需的往往是对传统文化自身广泛的了解和真切的体会，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时代的影响和局限，我们这一代学者，除少数优秀学者之外，“旧根底”和“新眼光”是有所欠缺的。这要寄希望于年轻学者了。

记：谈到年轻学者，您会给他们提出哪些忠告和期待？

吴：学术研究是一条有风险而且艰辛的路。高校的年轻教师各方面压力很大，我听到一些怨言。我是理解的，谁没有年轻过呢？年轻教师是大学的中坚。老教师有义务尽力去帮助年轻教师成长，要当年轻人上升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要为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而呼吁。不过现实中，有人在埋怨中消沉，有人在行动中奋起，形成了两种生存状态：用功，很苦。不用功，更苦。作为过来人，我希望年轻学者不要被阴暗面所裹挟，要怀着学术界还是有良知和公正的信念坚定前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自己在学术道路的跋涉中，就经常感受到这种良知和公正的温暖。我的忠告是，抱怨于事无补，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

我期待中山大学的年轻学者不要只满足于发表多少篇论文，出了多少本书，评上某级职称。应该有更高远的自我期许和学术理想，有更宏大的学术局格，真正为中国学术和学科做出贡献。《楚辞》里有一句诗：“骋骐骥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如果骏马只是在庭院里打着圈圈跑，怎么可能成为千里马呢？学者不能只在小圈子里打转，要万里逸步，才能极夫远道。

记：您的教学、学术事务繁忙，您是如何安排工作与作息的？平常都做哪些运动？多运动是否对您的工作有积极作用？

吴：每个人的天生差异很大。我的体质偏弱，工作压力又较大，特别需要身心调养。我的工作与作息时间都较有规律，决不熬夜。正常的话，每天坚持打太极拳。早、中、晚各绕校园走一周，总约十公里。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一是要合适，二是要坚持。人文学科就是所谓“长命功夫长命做”的。前辈学者说过，学问不是靠拼命，而是靠长命。从容一些，走得更远。

吴承学教授代表作

名家评点：

古人诗云：“每逢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读竟欣佩欣佩，甚盼全书早日出版也。(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南京大学 程千帆教授

我读《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以及读《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

——原中华书局总编辑 清华大学 傅璇琮教授

吴承学教授治学严谨踏实，目光犀利，既擅长理论思考，又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两者相合而能引领一时学术风气，他在长期从事的中国文体学、中国文学批评、明清诗文研究等领域，能够努力清理本土学术资源，回归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尝试构建具有汉文学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当代文史界卓然成家。特别是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用“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学术胸襟，开启了文体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站在了我国文体学研究的学术最前沿。吴承学教授又注重团队合作与梯队建设，他带领的中山大学古代文体学研究团队，无论在成果产出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复旦大学杰出教授 王水照教授

吴承学教授积二十多年的愿心与功力，长期聚焦研究中国文体学，从文体史的个案与专题，到文体理论的疏理挖掘、再到学科体系的重新建构，掘井及泉，深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源之地，发现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重大的历史经验与思想源头，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由丰富的文体实践而产生的众多文学现象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的角度来寻找原因，作出解释，以及生发新义。我认为，吴承学教授这一系列的研究关键意义在于：发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生命力所在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大大改写了五四时代西方文学观念所主导的以虚构类、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因而重新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学所蕴含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他的研究，是代表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他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论述，其学术创新的时代意义与文化思想前瞻的重大意义，必将越来越显示出来，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 胡晓明教授

科学前沿

陆家海：One Health

——引领公共卫生新方向 抢占预防医学制高点

One Health理念旨在扩大人类、动物和环境三方健康的跨学科协作和交流，要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医生和兽医等人员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最佳健康的目标。

我校公共卫生学院陆家海教授及其团队利用One Health理念长期开展课题研究，例如，“广东养猪从业人员职业性暴露与甲型流感病毒感染的关系”课题研究、河南省农村地区狂犬病基线调查、中山市登革热防控研究等。这些研究均取得重大成果，其中，中山登革热防控研究成果获得国际认可。

记者 孙天宇、蔡亲贤

记：您个人对于One Health这个理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陆：目前人们的健康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仅依靠单一的部门或学科是无法解决的。首先是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比如传染病的暴发，现在的传染病和以前有所不同：过去，传染病都是在人之间产生和传播，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动物。有数据表明，目前70%的新发传染病或者再发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这种情况下，纯粹只靠公共卫生部门(或者叫疾病预防部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动物传播的传染病必须由农业部门、兽医部门、野生动物部门共同研究。第二是需要多个学科的交叉，在外界很多人看来只有公共卫生学科和医学在研究疾病，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疾病的学科还包括兽医学、环境科学以及农业科学等。当前人与环境关系愈来愈密切，需要人们进行多学科、跨地区、跨部门、跨国家的合作，共同面对人类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或者说健康问题，这就是One Health——惟一健康。

记：谈到国外One Health的发展，您觉得我们跟国外相比有不同？

陆：目前One Health在我们中国被认可和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现实问题用传统方法无法解决，虽然人们接受了这种理念，但在实践中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举个例子，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在食品加工过程中非法添加和造假，但是这类问题是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解决的，因此这不是根本性问题。食品安全的根本要追溯到食物源头，比如禽流感，就是从食源引起的，我们食用的鸡中有禽流感病毒，导致人患禽流感疾病。因此，解决这种食源性疾病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多学科交叉和多部门联合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了禽流感的时候，公共卫生部门要求将病毒控制在源头，但农业部门会认为这样会使他们蒙受经济损失，双方会产生冲突，但没有人去协调这个过程。

所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疾病的防控问题，我们需要多个部门和领域的人共同去商讨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从广东非典之后，我们形成了联防联控机制，即多个部门的协作，禽流感H7N9和最近刚刚发生的寨卡病毒也都是多个部门联控的。但是这种联控是应急状态下的临时应对，没有形成常态。反观美国，在解决食源性疾病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将One Health理念贯穿于法律之中。美国的疾控中心专门成立了One Health Office，专门代表政府协调学科与部门之间的合作，这种协调才是正常的。但我们却是每次在疾病来了以后才临时组织这些部门去应对，这种应对是被动的，我们应该采取主动的应对模式。

记：目前我们在发展One Health这个领域上做了哪些努力？

陆：从开展的活动来说，近几年，我的团队一直在中国倡导One Health的理念，推动学科的形成。2014年11月，中山大学主办了中国首届One Health国际论坛，来自十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以及不同部门的人员参与了会议，会议的组织者还包括美国杜克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这两年以中山大学为基础，我们也成立了国内第一个One Health研究中心，2016年1月，我们在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了第一个One Health的Workshop，由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我的团队一起担当授课任务，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院校、不同部门的50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丰富，反响强烈。3月19日，我们举办了基于寨卡病毒的新发传染病防控论坛。这是中山大学联合广东省疾控中心、广东省检验检疫局举办的一个小型高层论坛。我针对疾病防控提出了“防控新理念，合作新机制”的One Health理念，也致力于将其应用于实践。目前来讲，我们成立了One Health研究中心，现在和美国杜克大学、弗罗里达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这几所大学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很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从学生的培养来看，中大处在广东，是中山先生一手创立的，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本科生的培养上，我们今年3月份会翻译出版国内外第一套One Health的书籍作为教材，希望可以得到相关的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希望能够在本科生培养时期开设One Health的通识课程；公共卫生学院去年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从2015年已经开始招生，这个专业也将贯彻One Health理念，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按照学校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技术领导型专门人才。检验与检疫的目的就是从健康的角度保证国家安全，具体内容就是在重大传染病的传入和传出以及物品国际贸易方面保障健康安全，在国境线上建立安全屏障的技术保障，使出国人不能把病毒带到国外，同样使得外国人不能将病毒从国外带到国内。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上，希望在中大能够逐步开设One Health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我本人也曾邀请国外的学者包括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在学院举办过多次One Health的讲座。目前来讲，在中国，One Health这个理念和学科主要是由中山大学团队来推广的，也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专家和相关人员的接受和认可。我们正在努力培养后续的人才，希望成为One Health学科的领跑者。

记：以中山登革热为例，我们也有一些传统的防控方法，One Health与这些传统方法相比有何优势？

陆：2011年，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山疾控中心联合成立了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中山研究院，我的团队在中山开展了几年的研究。期间我的团队遇到了很多公共卫生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登革热。中山毗邻广州，一直是登革热防控的风向标。2013年，广州市近1300万人口发生登革热1300多例，而中山市300余万人口登革热病例是800例。2014年，广州从1300例变成了50000余例，而中山从800例变成600例。也就说明用One Health理念和技术去防控疫情是有效的。通常我们防控登革热是跟着疫情跑，但有很多登革热病人是轻症的、隐性感染，他们没有太多的症状，而没有症状的人不易被发现，就更容易将病毒传播出去，我们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隐性感染是登革热最重要的威胁因素》来解释这个问题。往年夏秋季节是登革热高发期，但是2015年在1月份就暴发了登革热疫情，这说明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蚊子的生存环境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将社会因素、空气因素、湿度因素等考虑在内做了一个风险评估模型，用多种理论去寻找风险因素。可以说，在中山登革热防控上，我们总结出了具有特色且行之有效的中山模式。

记：既然我们已经在中山做出了成果，政府有没有意向用这个中山模式去进行疾病防控？中山模式适不适合应用于其他地区的疾病防控？

陆：当然是适合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许多媒体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等都做了报道和转载。去年，广东省主管就在疾控部门学习中山模式和推广中山防控经验，登革热防控在广东其他地区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记：您对One Health的理念应用前景如何设想？

陆：One Health可以应用于很多领域。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食源性疾病引起的。2008年到2010年出现的欧洲黄瓜事件就是携带致病性的大肠杆菌从美国传播到了欧洲。再一个是抗生素的问题，养殖过程中为了预防鸡、猪、鱼的疾病，大量使用动物抗生素，导致了整个环境中、水中抗生素严重超标，这也是One Health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要通过多部门、多学科的交叉来解决。除此之外，用One Health的理念和协作机制可以推动城市的建设。香港离广东这么近，也是亚热带气候，为什么广东爆发登革热而香港不爆发？因为我们所建的高楼大厦和城市规划，没有考虑自然环境对蚊媒控制的影响。因此我们要用One Health理念提前去解决这些问题，合理规划城市发展。

记：您觉得您的团队以及中大的公共卫生学院在这个One Health理念上是扮演着什么角色？

陆：应该是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我们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了第一个One Health研究中心，搭建了国内外的研究平台。

记：您下一步的构想是什么？

陆：首先，我希望用我们现在One Health的理论和技术，对一些新发再发等重大传染病包括蚊媒传染病进行防控，如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西尼罗河热，基孔肯雅热等，建立主动的防控模式。目前我们也正在申请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基于One Health理念，针对外来重大传染病开展预警、溯源和防控的关键技术研究。

其次是将One Health变为一个真正的学科，我认为这与罗校长提出的培养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和家国情怀的目标相契合，与培养国际一流学科的要求相一致，希望能得到学校的认可和推动。